

新锐T台·青年学者扶助计划

访谈提示

面对当下“内卷”“鸡娃”等现象背后教育焦虑的蔓延,教育观的改变成为社会的普遍关切。新近出版的《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一书,通过对一个家族100多年来微观养育实践的口述史研究,揭示了民间养育学的智慧与局限,讨论了教育焦虑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围绕如何从民间养育学中探寻教育的出路和挖掘教育的真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对话了该书作者安超。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当下,面对“内卷”“鸡娃”等现象背后教育焦虑的蔓延,教育观的改变始终是公众的普遍关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实践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安超在《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版)一书中,开启了对以往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养育文化的审思之旅。通过对平民家族100多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养育实践的口述史研究,揭示民间养育学的智慧与局限,呈现出当下教育困境背后的复杂图景。民间养育学蕴藏着怎样的智慧?社会变迁与传统养育文化的断裂给教育带来了哪些问题?良好的教育生态何以重建?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与安超展开了对话。

重返乡土: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审思

记者:在现代教育话语盛行的今天,“民间养育学”的概念令人眼前一亮。如书中所界定的,“养育”涵盖着更宽广的、融贯于生活世界的教育行动。请您介绍重返“养育”的初衷。

安超:这个选题与我生养孩子的生命经验直接相连。我与母亲、婆婆三个人在育儿观念上冲突不断,不同代际文化力量的拉扯及其所引发的痛苦是我研究的起点。在我看来,与更为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教育”相比,“养育”还包含了大量机械琐碎的、通常由女性来承担的情感与照料劳动,我称之为“婆婆妈妈的教育学”。比如,我婆婆哄孩子时唱的童谣,遇到育儿问题时婆婆和妈妈得心应手的“土办法”等,都让我逐渐改变偏见,对民间养育的智慧 and 力量重新建立了理解。但这些养育的“自然逻辑”,常被认为是不值得书写的,更无法跻身于知识生产领域。因此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重拾、确立“婆婆妈妈的教育学”的价值。

记者:结合您对安氏家族几代人养育实践的微观研究,您认为在现代教育科学化的语境下,应如何理解民间养育学的智慧?

安超:我可以用几句民间俗语举例概括。首先是大人通过“身教”给孩子确立的底线性教养,比如“人穷志不短”的道理在养育中常体现为对吃饭礼仪的强调,即便家里穷得吃不饱饭,见到美味食物的时候也要保持克制与尊严,不可失态;第二点是乡土社会较为宽松的教养方式包容了孩子野性的原力和自由探索的精神,也就是俗话常说的“粗里粗糙的好养活”,这有利于孩子自由意志与主体性的生成;此外,老百姓有一种“举头三尺有神明”的神圣性循规,即对于生命、自然、读书等神圣之物的敬畏,这深刻地影响着孩子人格与品性的养成。

何为“拉扯”:社会变迁中的教育困局

记者:您在书中谈到,“拉扯”一词既是指养育孩子的民间土话,又用以形象地指代平民养育在社会变迁中遭遇的复杂张力。能否具体谈谈中国家庭在当代教育中面临怎样的“拉扯”?

安超:在中国社会迅速转型的当下,家庭常常是三代人组成的网络化的核心家庭,抚育者带着各自的文化印记来教养一个小孩,不同代际的文化和情感冲突便凸显出来。且由于市场经济时代的阶层分化、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等背景,子辈承担了父母和祖辈对儿童经济层面(未来养老)与情感层面(精神寄托)的全部期待,助推了成人对子辈的过度控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代际关系紧张。儿童也在闭锁的家庭空间和过度之爱中失去了自立精神和公共意识的养成。上述冲突并非无法

化解。家庭是一个情感组织,我很认同北师大陈建翔教授提出的“家庭隧道清理”概念,即家庭成员通过对自身成长的回溯和彼此倾听,不同代际之间的理解是可达成的。本书的写作也是我重走成长之路的尝试,个体在社会的结构性冲突之中,依然可以发挥能动力量。

记者:您提出在结构性教育焦虑下,出现了母职至上和“完美母亲”的期待,从而导致了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这对女性的自我认同与发展有何影响?我们应倡导一种怎样的母职观?

安超:“完美母亲”的期待对女性而言意味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代价。弗洛姆将此种心理问题称为“无私病”,即当女性过度无私,仅将情感与精力投注于母亲这一身份时,苛求自己做完美妈妈的焦虑乃至抑郁便会到来。这不仅限制了母亲的自我发展,也会加剧母亲对孩子的控制欲,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因此,整个社会包括女性自己要意识到母亲不是女性的唯一身份,做好自己是做好母亲的重要前提。还应认识到,母亲不是孩子的唯一教育者。除了要强调父职的在场之外,中国传统“子不亲教”“易子而教”的智慧对现代教育很有启示意义。如果仅由父母来教养孩子,不可避免地陷入“关心则乱”的血缘关怀怪圈中,难以把握教育的分寸。要让孩子进入同伴及其相关的社会教育网络当中,在更广阔的情感共同体里探索和成长。

解围之途:重建文化互嵌时代的教育生态

记者:您提出了民间养育学的未来方向:“立”之劳动教育、“玩”之闲暇教育、“谜”之神圣教育。此设想虽聚焦教育内容,实则有助于整个社会教育生态的调整与重建。在传统民间养育学的文化传统已发生断裂的今天,这种重建如何可能?

安超:民间养育学的传统植根于超越小家庭范围的整个养育共同体所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变迁已我们将带入了文化互嵌的时代,在当下重建教育生态的关键依然是养育共同体的重建。城镇化虽然让我们在空间意义上挥别了“乡土中国”,但在城市里重建养育共同体也是有希望的。城市并非仅仅意味着理性、效率、竞争至上的市场文化,而是一个包容性的地域与文化概念,可以包容乡土的、现代的乃至未来的新生文化。重建养育共同体,有赖于建构充满人文关怀与巧思的公共空间。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北京海淀清河地区的社区改造实验就值得借鉴,他带领团队将社区中的废弃小空间,改造为经济成本低但非常实用的儿童乐园。当社区中有了人群能够互动的便利空间,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信任便有望重塑,民间养育中儿童的劳动教育、闲暇教育与神圣性教育也会随之在城市文化中找到新的形态。

记者:随着国家积极生育政策的实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等一系列旨在优化育儿环境的法规政策纷纷出台。这将对教育生态的重塑发挥怎样的影响?您有何建议?

安超: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政策的实施对于教育生态的重建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这是构建社会情感共同体和养育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需要更多跨学科、跨领域力量的联合、联动。例如,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要更多地关心、参与到城市规划和设计中来,从而更准确、细致地把握儿童成长、家庭养育、社会互动的需求;社会学家参与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则有利于提升城市规划对于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需要的敏感性。这样,围绕儿童友好理念建立起来的城市文化,将重新涵养一个儿童能够开展公共闲暇活动,养育者可以互信、互助的“生活圈”,让教育再次走出闭锁的家庭,得到“公共爱”的支撑。



助力『团圆』工作:马克思主义儿童观的生动实践

· 阅读提示 ·

马克思主义儿童观强调,少年儿童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应重点关注的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将马克思主义儿童观作为儿童保护工作的思想指南。近年来,我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社会组织为辅助并借助媒体平台强强联合的工作体系,使助力“团圆”工作实现了重大突破与进展,彰显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儿童观。

■ 吕其镁 常江

少年儿童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关系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问题。回溯马克思主义儿童的相关论述,对于我国新时代儿童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儿童观在中国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儿童观的核心观点是“坚持儿童的主体性与社会性的高度统一”。马克思首先指出,儿童是独立的主体,只有重视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独特性才能培养起主体性,也才能培养出人的“自由个性”,这种主体性只有在重视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来。其次,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少年儿童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应该重点给予关注的议题。马克思还曾明确指出,必须为儿童提供相应的社会帮助,“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必须加以维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代他们采取行动”;“只有通过变社会理性为社会力量才能做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将马克思主义儿童观作为儿童保护工作的思想指南,毛泽东曾为延安保育院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儿童工作,有力推动了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儿童事业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儿童受保护权利进一步得到有效保障。《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强调要让儿童“享有更加和谐友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要保护儿童在安全等领域的权利。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协调配合,以公安部“团圆行动”专项部署、社会公益组织“宝贝回家网”、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公益助力团圆栏目《等着我》等为代表进行联合行动,依法保障儿童权益,严厉打击了暴力、拐卖等违法犯罪行为。

助力“团圆”工作践行马克思主义儿童观

作为具有实践主体性的哲学,没有停留在抽象的思辨上,更关注的是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儿童观是助力“团圆”工作的思想指南,而助力“团圆”工作的各方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儿童观的实践体现。



首先,政府是助力“团圆”工作的主体力量,其中公安部门的“团圆”行动是近年来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国公安机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儿童观。据2021年7月13日公安部网站《通报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团圆”行动最新成效》一文中报道:“自2021年1月起,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妇女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妇女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仅仅经过半年时间,就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妇女儿童2609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61年。侦破拐卖妇女儿童积案147起,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372名,各地已组织认亲1200余场。”

第二,社会组织在助力“团圆”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宝贝回家寻子网”便是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组织之一。由于拐卖是一种难以治理的犯罪,限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种因素,政府在提供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不足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配合与弥补。由张宝艳女士于2007年4月29日创建的“宝贝回家”寻子网是我国第一家为失踪者家人提供免费助力“团圆”服务,帮助走失、被拐儿童寻找亲人的民间组织。据“宝贝回家”网站显示,截至2021年11月21日,已有30多万志愿者帮助近4136人找到了亲人。“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以其纯公益性和专业性享有较高声望,在构建有效的打拐社会联动机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宝贝回家”与公安部刑侦局建立长效合作联动的打拐机制,公安部在网上开通“打拐”信箱,并派员加入“宝贝回家”寻亲网站QQ群。“宝贝回家”还对全国打拐工作建言献策。张宝艳女士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对人贩子加大量刑并终身追责的提案得到网民的热烈反响。“宝贝回家”还建立了助力团圆者及助力团圆联盟之间的信息共享。

第三,媒体平台与其他社会资源强强联合,成为重要的助力“团圆”力量。《等着我》是央视综合频道与“宝贝回家网”联合创办的一档大型公益助力团圆栏目,于2014年4月开播。《等着我》以官网为基础,聚合公安部、明星、专家、志愿者以及全媒体等助力“团圆”力量,形成了“全媒体公益助力团圆平台”,当前已经帮助超过19000个家庭实现团圆梦。节目播出后得到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收视率创造了央视最高收视纪录。在第五季黄金档播出的16期特别节目中,有11期的收视率排名当周所有综艺节目的第一名。

《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综合治理、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工作方针,对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实行坚决打击。投身于助力团圆和打击拐卖儿童工作的人们,以坚持不懈的行动彰显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儿童观。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视窗

《工作权国际标准的女性主义反思》

作者:陆海娜

工作权是国际法保护的一项重要人权,也是妇女实现经济赋权的主要途径。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主流工作权法理学仍然更多地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存在着关键的性别盲区,不利于实现工作权的性别平等。本文借助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梳理分析现有工作权国际标准中的几大性别盲区,即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无酬家务照料劳动不被承认,市场对有薪照料工作的价值低估,忽视女性面临的职场资源不平等,以及性别与职场空间的关系。作者提出工作权的国际人权法标准应做相应的更新以弥补上述缺陷,才能有助于真正实现其性别平等原则。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

《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进展与启示》

作者:刘蕾

女性是应对气候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国际社会已逐渐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重要意义,性别议题在气候谈判中的主流化趋势明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层面纳入性别考虑取得了长足进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已将性别政策纳入机构政策体系,并积极在项目层面推动性别政策的实施。本文作者建议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性别问题研究,为履约工作提供支撑;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体系中纳入性别考虑,加强与性别领域的沟通协作;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机构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明确职责安排;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内项目、“一带一路”项目和“南南合作”项目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切实加强中国女性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高女性对气候行动的参与度。

来源:《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1年第5期

《提升教育能降低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吗?——基于CFPS数据的证据》

作者:屈小博 胡植尧

本文基于2018年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受教育程度的边际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中国教育婚姻匹配以“门当户对”为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高男低”的婚姻匹配现象也越来越常见。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影响工作收入和工作时间等经济因素,显著降低了其家务劳动时间,也缩小了家务劳动时间性别之间的绝对差异。同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降低传统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不平等;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尤其是高中教育的普及率,可以降低家务劳动时间分配的性别差异。

来源:《学术探索》2021年第8期

(范语晨 整理)